



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

□ 赖嘉姬 龚齐珍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红色戏剧是备受苏区军民欢迎的一种文艺形式。红色戏剧运动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丰富军民文化生活、争取革命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红色戏剧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部队中的宣传队就以口头宣传与演戏相结合的方式，在部队作战间隙对群众进行宣传，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阐明革命道理，启发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提出了宣传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认为戏剧形式的化妆表演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

此后，党更加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尤其是运用活报剧、话剧等文艺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931年4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规定，要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每个俱乐部要设演剧组。与此同时，从苏联回国和从上海转移的一批文艺骨干相继来到中央苏区，给红色戏剧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俱乐部、剧团、剧社等相关团体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创作出一大批为革命战争和人民群众服务的戏剧作品，并广泛开展宣传演出活动。《俱乐部纲要》《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等一系列制度相继颁布，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运动逐步走上大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道路。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等8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军部队的宣传战士依然坚持话剧演出、文艺宣传，鼓舞士气、增强斗志。抵达陕北后，红色戏剧的种子撒向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色戏剧运动的形态

红色戏剧是苏区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娱乐、宣传、教育“三位一体”的功能，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发挥好其独特作用，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把戏剧宣传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戏剧运动组织化。1931年底，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性剧团——八一剧团成立。在八一剧团的带动下，地方和红军部队陆续组建了各种剧团，经常深入农村和部队进行演出宣传，受到苏区各界的热烈欢迎。1932年9月，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领导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专门机构——工农剧社总社。通过制定《工农剧社章程》，工农剧社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宗旨目标的研究、创作和表演戏剧的机构，同时还对中央苏区的戏剧运动进行指导和管理。此后，地方剧社和红军剧社纷纷成立，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剧社组织体系。据1933年5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记载，其时已在汀州、叶坪、红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多处成立了工农剧社分社，约有会员六七百人。1933年4月，工农剧社公演的话剧《我——红军》，给苏区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获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红色中华》报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开启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工农剧社成为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极大地促进了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发展。

大地促进了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发展。

戏剧人才专业化。为培养戏剧演员和艺术干部，工农剧社于1933年4月创办蓝衫团学校。1934年，瞿秋白领导苏区教育和文艺工作后，将蓝衫团学校改成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增设了地方班和红军班，招收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主持制定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形成了系统的戏剧人才培养制度。在师资配置上，戏剧学校教师队伍强大，文艺人才众多，既有李伯钊、石联星、王普青、刘月华、施月英、施月娥等专职教员，还聘请了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等兼职教员。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艺术与现实相结合，老师们经常带学生到各地巡回演出。在蓝衫团学校开学不久，大多数学生就“出发去博生兴国于都等地，将在那些地方举行讲演，并帮助当地俱乐部组织‘五一’晚会及化妆宣传队等”。戏剧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育了一大批学生，锻造了一支支鼓舞和激励苏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宣传骨干队伍。

戏剧创作大众化。从创作来源看，广大工农兵群众是红色戏剧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使得苏区戏剧运动生气勃勃、气象万千。从题材内容看，这些剧目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人民的现实生活。它们中有再现革命场景的作品，如《活捉张辉瓒》《你是哪个部队》；有宣传各类社会运动的作品，如《春耕战线》《战斗的夏天》；有批判封建迷信思想的作品，如《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破除迷信》等。为鼓励大家的创作热情，工农剧社连续数次在《红色中华》报上刊登征求剧本的启事。据1999年7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江西省文化艺术志》记载，工农剧社创作和征集到的剧目有12类，共达300多部。

戏剧演出灵活化。为了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主张，推动苏区

的中心工作，各剧团经常深入乡村巡回演出，动员群众努力生产、支前参战、保卫红色政权。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和身处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苏区无法建立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因此演出活动的临时戏台大多是即兴搭设，演出时间相对灵活。项英、何叔衡、陈潭秋、瞿秋白等领导人常站在群众中，和大家一起看戏，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肖劲光等红军将领还亲自登场、官兵同台表演。

红色戏剧运动的革命作用

红色戏剧运动始终都是围绕着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展开的。因此，每逢春耕、识字、查田等运动兴起，都会有以该运动为主题的戏剧演出。例如：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的“红五月”扩红运动中，苏区各地剧社、剧团排演了《劝郎当红军》《欢送哥哥上前方》等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仅1933年“红五月”一个月内，江西苏区扩大红军约2.5万人，其中红色戏剧演出发挥了重要的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红色戏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提高红军对革命形势的认识，鼓舞红军和群众的革命信念而创作的。如在兴国龙岗活捉国民党18师师长张辉瓒后排演的《龙岗擒瓒》，连演上百场，通过戏剧表演反映前方战争的胜利，以此鼓舞士气，大大激发了苏区民众的革命斗志。

戏剧演出还编排了许多具有教育意义的剧目，专门在苏区乡村进行演出，提高了苏区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小蓟青青思乡情

□ 刘明礼

春风和煦，万物复苏。带小外孙在小区里“寻找春天”。寻寻觅觅中，于花池边发现一株青翠欲滴的小小绿植。小娃问我这是什么花？我定睛一瞧，原来是棵野菜——家乡人所称的“青蓟菜”。这棵小小的青蓟菜，竟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乡愁”……

青蓟菜又名小蓟、青刺蓟、青青菜、蔓荬菜、刺儿菜等，是一种常见的可食用野菜，广泛分布于我国大江南北。在我们冀中老家，当地土话叫“青芥菜”，当为“青蓟菜”的谐音。近代名医张锡纯在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也就说：“蔓子菜为蓟字之谐音。”由此看来，老家人对这种野菜的叫法还是蛮正宗的。

青蓟菜药食同源，不仅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还含有多钟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其中维生素B、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的含量都比较高，能调节人体免疫功能，增强造血功能，对提高人体健康水平多有裨益。作为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其性微寒，能凉血止血，可以预防身体因血热引发的多种疾病。以其入药，不但能清热，还能解毒消肿，治疗痈疽肿痛。食用之能调理气血，促进代谢，加快身体内毒素排出，预防多种上火症状发生。宋代医书《本草图经》载：（小蓟）处处有之，俗名青刺蓟。二月生黄……四月采苗，九月采根，并阴干入药。《日华子本草》《本草纲目拾遗》《中药志》等诸多中医药典籍，对其功效、用法、主治病症等都有所记载。

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家乡土地上的草一木我都再熟悉不



过。家乡虽地处平原，有辽阔的土地，但由于干旱缺水，常见的野菜多是一些适合旱地生长的植物，如荠荠菜、蒲公英、苦苣菜、青蓟菜、铁扫帚、野苏子、车前草、燕子尾、面条菜、马齿苋、野蒿子、灰灰菜等。而在这些野菜当中，最早发芽、可食期长的，非青蓟菜莫属。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老家的春天宛如江南，一夜春风催花开，桃花红，李花白，风吹麦绿，鸟语花香，田间地头的青蓟菜也争先恐后蓬勃起来，给大地带来无限生机。我的儿时处在一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每年这个季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冬天储存的萝卜白菜所剩无几，越冬蔬菜刚刚返青，每天餐桌上除了干菜就是咸菜，人们自然把野菜作为一种补充来源。鲜嫩的野菜，有的可供人食用，有的还可以拿来喂养家禽家畜。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会儿的农村娃

放学后基本上不用大人嘱咐，便三五成群背筐提篮去地里挑菜了。青蓟菜是野菜一族里的生力军，一簇簇鲜嫩翠绿，一棵棵挺挺苗壮，散发着清新的香气，自然成为挑菜的首选。

挑青蓟菜，最应手的家什是一种专用的打草刀。其刀头与铁柄一体打制而成，形似镰，片厚刃利，装有木柄，可剜可砍可割。找到一株青蓟菜，贴着地皮轻轻一砍，捡起来扔进筐里。捡青蓟菜时，最好用两个指尖轻轻捏起——因为它的叶齿有一圈小刺，不小心会扎破手指。这件事看起来挺简单，可地里的青蓟菜并非随处可见，必须得睁大眼睛，四处寻找，所以挑满一筐往往要转悠半天，走出好几里地。那时候，我们就是用这种特殊方式去“踏青”。几个小伙伴一边嬉戏玩耍，一边挑菜。庄稼地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知道青蓟菜有止血消炎的作用。有时不小心被镰刀或什么东西划破了皮肉，揪几片青蓟菜叶，揉出汁水

滴到伤处，立马就能止血。挑了大半天的菜，孩子们伴着夕阳的余晖各自回家，大人们把青蓟菜洗干净，捧上饭桌蘸酱生吃……

暮春时节，青蓟菜顶上开出淡紫色的花，清新雅致。花儿凋谢后，会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白色的花絮，微风吹过，种子随风飞扬，寻找一处合适的土壤安身立命。此时的青蓟菜虽已变老，不再适合人吃，却是禽畜的上等饲料，而且禽畜吃了不会得病。家乡有句俗语：“地贫人要赖，光长青芥菜”，道出了青蓟菜生命力之顽强。从春到秋，经过多少次的耘耨耕耨，它不折不扣，依然从容生长。到了深秋，田间的多数杂草都已枯萎，青蓟菜却再次焕发生机，为萧瑟的大地缀上点点葱绿。这时的青蓟菜，甚至比春天还要鲜嫩，再次成为人们的食物。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青蓟菜等野菜帮家乡人解决了很大的生计问题。

小蓟年年青，几度夕阳红！故乡一别40余载，当年那个背着筐头割菜的少年，已步入花甲之年。几十年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再也不用靠饲养禽畜贴补家用，更不需拿野菜去填饱肚皮。可对于从艰苦年代走出来的一代游子来说，这青青小蓟，作为家乡的一个符号，却深深刻入了我的记忆，固化为一种别样的乡愁！



□ 贾婷婷



故乡具有慰藉心灵与滋养生命的精神力量，最能拨动在外游子的心弦。正因如此，在中华传统诗词文化中，乡愁成为重要主题。而借诗抒怀、消解乡愁的文学表达，在中国古代诗歌鼎盛时期的唐代尤为普遍。

在唐诗里，时常能读到游子思念亲友的浓浓乡愁。“小几名伯离，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李白客居他乡，茫无定止，想到一双儿女无人怜爱，不禁心忧如煎。“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感叹骨肉离散，相逢无期，遥想兄弟们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图景，以此慰藉思亲之苦。“别母乌南逝，辞兄雁北还。宦游偏不乐，长为忆慈颜”，张万顷宦游途中时常因思念母亲而满怀愁绪。

怀恋故乡风物习俗也是唐诗中乡愁表达的要素。“正月蜂相见，非时鸟共闻”“江柳非时发，江花冷色频”，杜甫发觉异乡的花鸟与故乡不同，认为它们出现在“非时”，还颇显“冷色”，满怀对故乡风物的偏爱。沈佺期被流放在外，逢遇寒食节，不禁想念起家山岭南风俗，并作《岭表逢寒食》，感叹“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访”。

乡愁因游子离乡别亲而生，唐诗乡愁作品之多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仕进之路日趋开阔，而且唐代疆域辽阔，朝廷重视边功，唐人建功立业的抱负高涨。然而求仕之路充满坎坷，诸多不如意之处难免加深游子的漂泊之苦。

科举制中的常科和制科取士亦需要求仕者长期离家远赴京师，科举及第并非易事，且任官后仍需离乡仕宦，因此，士人在漫长的宦游经历中常因羁旅生活的孤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生怀乡之情。据宋代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选举考二》记载，唐代科举考试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只有二十余人，流传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即50岁的人考取进士都算比较年轻的。士人们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还需要有高官名士的援引，因此唐代行卷之风盛行，求仕者往往奔走他乡四处请托以得权贵引荐；当考取功名后，由于“本籍回避”的任官制度，任官者又要赴他乡任职，很多士人因此长期游历在外。杜甫曾困守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就描述了诗人向权贵请托的悲辛与屈辱；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他在80多岁才告老还乡；白居易也曾发出“官历二十政，宦游三十秋”的感叹。

出塞建功也是唐人求取功名的重要途径，然而作战的危险环境、边疆的艰苦生活、战争的残酷无情及壮志难酬的不平，常使人滋生思乡盼归之情。“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风从帝乡来，不异家信通”，岑参怀报国之心，曾两度出塞，但伴随边塞生活的艰辛寂寞和壮志难酬的惆怅，初升的太阳和东来之风如同家乡的信物一般触发了诗人的思乡心绪。

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由治转乱、由盛而衰，百姓遭遇了家园残破、骨肉分离的劫难，随之反映离乱之苦的乡愁诗篇大量出现。杜甫这一时期所作的《春望》《野望》《月夜忆舍弟》等诗，既抒发了自己对家人的牵挂与担忧，也蕴含着忧国忧民的情怀。“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还。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晚唐诗人韦庄因战乱羁旅于南方，等到芳草已枯萎却仍没有盼来故乡亲友，寄出的家书也无法送达，诗中饱含着因战乱导致家人离散的无奈与悲哀。

唐代诗人能够抒发感人肺腑的离愁别绪离不开高超的表达方式，他们将外在的物和心中的情高度融合，创造出饱含情感的意象，以“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美，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在唐诗抒发乡愁情感所运用的众多意象中，有象征归途漫漫的长路、天边、云岫，有象征羁旅艰辛的风、雨、雪，有象征人生漂泊的秋

蓬、浮萍、孤舟，有象征可以连接故乡与异乡的鸿雁、明月、流水等，可谓万象。

王维谪居济州时与同在异乡的济州刺史登高望乡而歌：“悠悠长路人，暧暧远郊日。惆怅极浦外，迢递孤烟出。能赋属上才，思归同下秩。故乡不可见，云水空如一。”王维登上高楼欲遣乡愁，然而望尽天涯路也望不到故乡，视线还被远处空蒙的云水遮蔽，心中充满了惆怅与落寞，诗中对长路悠悠、云岫阻隔的描写渲染了诗人离乡之远与归乡无期的境况，抒发了诗人无尽的思念之情。

“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杜甫以蓬草“自比”，借蓬草随风飘荡、难以扎根的特点表达了在外漂泊的孤寂之感。

“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诗中山程水驿、凄风苦雨的景象，映衬了诗人杜牧行旅的艰辛和心境的凄凉，看到飞来的鸿雁也不禁想要向它们询问故乡的消息，抒发了诗人欲归而不得的怅惘。因为鸿雁常被视为空中信使，所以每每被诗人寄予传送家书的期望，如杜甫在《秋夜客舍》中就因“北书不至”而责怪“雁无情”。

“宁知故园月，今夕在兹楼”，韦应物楼中望月，发觉故乡的明月照进了楼中，轻柔的月光让诗人暂时放下了沉重的乡思之苦。望月思乡怀人是我国古老的抒情传统，“月”是唐诗中抒发乡愁情感的常用意象。如张若虚说“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流水不受阻隔且连绵不绝，奔向故乡方向的流水就成了连接故乡与异乡的纽带，思乡泪似乎可以凭借着它而流向故乡，岑参由此将乡愁寄托于绵绵流水。

唐代诗人以深沉的情愫、动人的笔触抒写了他们形形色色的乡愁。乡愁丰富了唐诗的意蕴，唐诗承载着唐人思乡的无尽情思，它穿越千载时空，仍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饱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给我们以无尽的回味。

